

数字赋能,尤其是AI赋能,正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女性在AI时代不能落后,她们的智能与贡献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本文深入探讨了女性数字赋能的必要性,指出女性参与AI研究和开发有助于消除性别偏见,推动社会公正。女性不仅要在AI理论研究中发挥作用,更要积极学习并掌握这一普适性技术,以提升自身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在新时代背景下,女性数字赋能不仅关乎个人发展,更是实现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目标的关键一环。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中的女性数字赋能

■ 肖巍

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一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2024年6月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024年6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教授的回信中提出“继续探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推动学科交叉与前沿创新,打造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基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作出新的贡献”的要求,这不仅是对全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鼓舞,也为新时代女性数字赋能指明了方向。数字赋能泛指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来提升个体、组织、社会的效能和竞争力的过程,而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赋能的核心内容便是AI赋能。

AI与大数据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AI研究是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的学科,其运行机制和目的是模仿人类思维,通过使用算法和数据来工作。AI也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交叉的学科体系,并不局限于计算机学科中的某一领域或某一分支。近年来,AI正在迎接一场由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大模型引领的爆发式发展。2022年年末,OpenAI推出的ChatGPT标志着这一技术在文本生成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2023年被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之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利用复杂的算法、模型和规则,从大规模数据集中学习,以创造新的原创内容的AI技术,它能够创造文本、图片、声音、视频和代码等多种类型的内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女性数字赋能必须摆上日程。

女性不能落后于AI时代

AI有时也被称为机器智能,指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自然智能不同的、由机器所表现出的智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教授斯图尔特·罗素曾给出一个解释,AI就是使智能机器化。在人类认知科学的

历史上,我们一直绕道前行,例如通过借用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建构的理性行为模型来研究人的认知行为,而AI极大地拓展了智能研究的空间。罗素把AI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狭义人工智能(ANI),指AI能够执行一项任务,其水平与人类相同或更好;第二阶段为通用人工智能(AGI),指AI能够像人类一样推理、解决问题、抽象思考和轻松地作出选择,并且结果相同或更好;第三阶段为超级人工智能(ASI),包括一个能够更好地完成人类认知任务到比人类聪明数万亿倍的系统。然而,无论如何发展,AI都是为人类服务的,旨在研究人类的智能,而不是计算机如何运作。围绕着AI研究,人们可以提出许多有趣却难以解答的问题:人类的智能究竟如何?机器能够模仿人类智能吗?机器如果能够和人类一样,它是否就是人类?超级人工智能(ASI)有可能存在吗?它的出现会对人类构成什么致命威胁?如何规范和引导AI革命?如何利用AI消除性别不平等?AI如何影响社会性别建构?如何利用AI推动性别平等?既然AI是一个复杂和多元交叉的学科体系,对于这些交叉性、开放性问题的讨论便不仅涉及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也关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等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AI好似一根杠杆,正在通过推动各个相关领域的发展,以及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来撬动世界。在这一背景下,培育领跑国际的拔尖人才,开发和普及AI技术应用都是AI赋能的主要任务。为了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中作出新贡献,新时代女性必须主动紧跟科技发展新方向、新潮流,而不是被动地被AI驱使,不仅要在AI理论研究中作出贡献,也要学习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技术,从计算机和AI基础理论开始学习,立足本职增强自身开发和使用数字技术的本领、提高工作效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姚期智教授在谈及追求知识的勇气和路径时说:“人如果有勇气在一个新的科目、新的问题上投身进去的话,往往回报是非常大的。一个学科、一个事业,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就身处其中,在里面几乎所做的任何工作,到后来都很有希望变成一个领域里的领头羊。”因而,女性不能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AI时代落伍。

女性智能在AI发展中占据半壁江山

以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符号主义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句法,语言有一种天生结构,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AI之父、英国计算机科学家杰弗里·辛顿反对这种看法,强调语言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人类理解的本质不仅是符号和规则操作,也需要通过学习之间的特征和这些特征之间的交互来完成。人类认知

和理解是计算过程,是大脑处理信息的结果,并不存在任何语言天赋。作为大型人工神经网络,AI正在通过大数据学习语言,其工作原理与人类的理解相同。因而,既然AI研究的是人类认知,占据全球人口半壁江山的女性智能也必须加入AI的发展之中,因为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同文化中的女性都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语言,语言发展不仅彰显出人类的力量,也代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AI发展应从数据输入和算法校正的源头上关注到人类的整体性。

纵观人类和AI发展的历史便可发现,女性智能早已融入AI世界,并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19世纪40年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程序员是诗人拜伦之女艾达(Ada),她编写的一组计算指令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套计算机算法程序,由此也第一次出现程序概念。1980年,美国将历时近20年研制成功的高级程序语言命名为Ada语言,并以她的出生年份设立了标准编号;自1998年起,英国计算机学会每年都颁发以艾达为名的奖项。如今女性也活跃在AI研究的各个领域,例如美国女哲学家阿曼达·阿斯科尔对AI伦理学的研究便颇具影响,她认为AI发展必须与人类价值观对齐,与人类向善的目标保持一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AI发展增进人类的福祉。

同时,女性数字赋能也有助于消除AI领域的性别偏见。许多计算机科学家意识到,AI大模型中有各种价值偏见和社会伦理问题,例如词语分析形成的词云显示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性别刻板印象,形容男性的词汇集中于世界、发现和生命等,而形容女性时则集中于乡村、丈夫和母亲等词语。因而,女性数字赋能,参与AI研究和开发,有助于以自身的性别意识和体验对语料进行性别校正,让其与人类社会追求平等和公正的价值观对齐,调整模型输出更为积极、对女性更为友好的内容。艾达早就观察到,“虽然机器可以实现负责的运算,但是只能按照人类的指令来运行,并没有自我分析真理的能力”。由于AI的运行机制和目的是模仿人类思维,所生成内容也是由开发者输入的数据决定的,因而,减少或者消除语料、算法和模型,以及应用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或者性别不友好内容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女性数字赋能更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2023年10月,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针对偏见和不公平问题,强调要坚持公平性和非歧视性原则,避免在数据获取、算法设计、技术开发、产品研发与应用过程中,产生针对不同或特定民族、信仰、国籍、性别等偏见和歧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与AI合作和共存,而女性数字赋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描绘珀耳修斯和安德罗墨达的彩绘石膏壁画”。 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摄

▼ 曲裾素纱单衣。 湖南博物院供图



力图寻找东西方女性之间的共性,从而呈现东西方女性视域下的“她力量”。在文物对话中,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各美其美的文化特色、美美与共的理想追求。

展览提供了众多了解东西方古典女性世界的窗口,从中可以看到她们的劳动生产、政治参与、精神生活与情感追求。事实上,无论是汉代还是古罗马,广大普通女性才是女性群像中的主角。

纺织工、裁缝、医生、骑兵等各种职业的相关文物陈列于眼前,遥望两千年前东西方女性或是穿花纳锦,铺锦列绣;或是妙手回春,救死扶伤;或是戎装上阵,英勇无畏。鲜活而昂扬的



女性形象跨越时空,宛然在目。

“古罗马与汉代就像天空中最闪耀的双子星,互相照耀,”许宁宁说,女性作为鲜活的个体,她们爱美、情感丰富、内心细腻,沉着、勇敢、坚毅的品格是相通的。

生活在相近历史年代、不同社会背景的汉代与古罗马女性,以巧思与勤劳、勇毅与坚韧,绽放同样璀璨的生命之光。她,既是唯一,也是万象。

在跨越时空的凝望与对视中,我们共情她们的情感与精神。在守护与创新中,我们看见历史,更看见未来。

(来源:新华社)

《程序性平权与结构性歧视:ChatGPT性别平等观的对话测试分析》

作者:宋素红 赵文娜 梁泽龙

ChatGPT在人机对话中是否内含了自身的性别观,成为智能传播环境中认识社会性别平等的新着眼点。本文作者通过与ChatGPT进行人机对话并参照扎根理论分析对话文本,发现它强调AI客观中立,表层认同现代性别平等价值观而深层隐含传统性别观,存在程序性平权与结构性歧视的矛盾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深浅层次表现出不一致的性别观,得到启示:要警惕人工智能无意识的性别偏见输出,加大性别平等政策对AI技术的保障;同时构建专业大模型,以“算法先行”原则助力人工智能的强大技术力量推进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

《数字空间生育议题的公众表达及性别差异:以新浪微博为例的分析》

作者:吴帆 高旭瑶

分析数字空间生育议题的公众表达,既能深化对人口动态变化微观逻辑的理解,也能为政策制定提供公众情感和态度方面的直接证据。本研究基于5300条微博文本数据,采用LDA主题模型和SnowNLP情感分析工具,探讨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初期及两年后公众对生育议题的态度表达及变化。研究显示,女性对生育的关注度明显更高。随着政策实施时间的推移,讨论从相对广泛议题逐渐聚焦于生育率问题。在数字空间里,公众对传统婚育观念的挑战、对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的追求,反映出社会价值观、个人权利与政策导向之间的多维交织。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

(白晨 整理)

婚育行为的变迁会对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态势产生巨大影响。顺应形势,与时俱进,探索婚育行为变动规律,倡导现代婚育新文化,无疑是积极应对低生育率,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近日,主题为“推进新时代性别平等 倡导现代婚育新文化”的学术沙龙在上海大学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围绕我国婚姻制度变迁、生育事件的影响和未来人口转型趋势等议题展开了积极交流与互动。

■ 计迎春

近日,主题为“推进新时代性别平等 倡导现代婚育新文化”的学术沙龙在上海大学成功举办。本次学术沙龙由上海大学妇工委常务副主任吴国琴和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陈蒙副教授共同主持。

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聂清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她介绍了上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主要工作成效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她希望通过本次沙龙活动,能够进一步推动性别文化和女性学课程建设,提升研究成果的社会实践应用,特别是在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方面,为推动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科学方法。

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张庆玲到会讲话,她指出,性别平等以及现代婚育文化的研究与探讨,在新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推动妇女和家庭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她期待上海市妇联与各高校妇女研究中心联手,共同打造上海妇女儿童发展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专家学者的观点分享、思想碰撞、思维创新,为促进上海妇女儿童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汇聚研究力量。

中国婚姻模式变迁对生育的影响:与日韩的比较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李婷教授从东亚社会面临的低生育率挑战出发,通过各类数据探索了我国婚姻模式变迁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并与日韩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首先,日本、韩国和中国经历了相似的婚育推迟,但我国的婚育推迟分别落后于韩国和日本10~15年和20年。其次,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仍然具有“推迟结婚”和“减少结婚”的潜力,这表明即使实施了生育激励政策,生育率仍然面临着“下降”压力。最后,尽管东亚社会的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持续上升,但是婚姻和生育的间隔却在降低,这表明东亚社会婚姻和生育仍紧密捆绑,生育意愿可能会对婚姻缔结有重要的影响。

生育对父母时间利用的影响:基于事件研究方法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于嘉副教授探讨了生育如何影响父母的时间分配。通过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的数据,详细探讨了生育对父母多维时间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对女性时间利用模式的冲击尤为显著,使得女性的工作、睡眠和娱乐时间减少,而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增加。相比之下,男性受到的影响较小,成为父亲后其工作时间有所增加,是“父职红利”现象的影响机制之一。研究还指出,在中国,女性工作时间在生育后随即减少,其后会迅速回升,但睡眠与娱乐时间的减少和家务时间的增加则长时间持续。受教育程度、主要照料者和居住地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女性的时间利用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于教授的研究表明,生育对父母时间利用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多样性,她强调了需要进一步关注不同类型家庭多维度的时间利用问题。

中国的出生人口趋势及对优生优育的启示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李强教授基于对中国出生人口趋势的分析,探讨了其对优生优育的启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50年以来经历了显著变化,政策设计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伴随预期寿命增长,个体生命周期被拉伸,劳动适龄人口和育龄人口的重叠加剧了生育的压力。初婚年龄的上升、女性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教育进步等因素,对生育和婚姻产生了深远影响。截至202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到4亿,流动人口的增加对婚育率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交媒体上关于生育的诸多热搜词条则显示出大众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李教授指出,男性晚育的趋势也引发了人们对子女发展复杂多基因疾病风险的担忧。在死亡率和生育率双双下降的背景下,生育数量减少和生育年龄推迟,使优生优育的必要性越发凸显。生育模式的改变、生殖医学的进展和生育支持体系的建立被视为应对当前生育挑战的重要手段。

第二次人口转变下我国大城市居民婚育行为变迁趋势研究

上海大学人口学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陈蓉副研究员在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年人口普查和几项社会调查等多个来源的实证数据,全面考察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我国大城市居民的婚育行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她指出,以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在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离婚和终身不婚上升等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特征上表现出“先导性”。但与欧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之路相比,上海的第二次人口转变还是表现出一定的“不同”,突出表现在同居目前仍主要是婚姻的试验而非替代,非婚生育虽然存在但仍罕见。这一最迥然的“不同”,究竟是上海乃至东亚社会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之路的“独特性”或者“独特路径”,还是“过程性”“阶段性”的差异?还需持续观察和研究。

晚婚少婚社会的来临? 基于上海相亲角的日常生活微观机制探析

上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计迎春教授基于对上海市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实地调研,从男女双方家庭的日常生活逻辑和动机入手,在规范、观念和意义层面讨论中国婚姻制度变迁,并发现了一条选择—经济基础—性别观念差异的三要素逻辑链条。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我国的传统普婚规范发生了松动,婚姻逐渐从人生的必选项转变成成为一种个人选择;在此基础上,新一代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原生家庭的大力支持,是她们可能作出晚婚或不婚选择的坚实经济基础;而在相对胶着和不对称的性别动态下,男女双方在婚育规范和非传统亲密关系等观念上存在的明显性别差异,这种“三观”冲突特别是性别观念差异,可能是年轻女性在现实情境中作出晚婚、不婚或非传统亲密关系的导火线。

主题发言后,有关高校妇女研究中心代表,上海市妇女学学会、婚姻婚姻家庭研究会会员,妇女干部代表、学生代表就我国婚姻制度变迁、生育事件的影响和未来人口转型趋势等议题展开了积极交流与互动。在互动环节的最后,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燕华以简短的点评为整场沙龙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她表示,婚育问题看似是个体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千家万户,不仅仅是家事也是国事,由此,她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专家们在如何破解难题和政策转化方面提出进一步的对策和建议;二是希望今后在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方面加强合作研究;三是希望与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和研究力量培养方面实现共建共享。

(作者为上海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